

宁夏回族聚居地区 精神文明建设中若干问题的 调 查 研 究

宁夏社会科学院

“精神文明建设理论问题研究”课题组

宁夏人民出版社

PDG

繁荣理论的必由之路

(代序)

马英亮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则之一，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国共产党六十多年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其中每一步胜利，都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结果；每一次失误，都是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赵紫阳：《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又一次树立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沿着这条理论联系实际的路子走下去，投身改革，深入实际，面向现实，反映现实，研究现实，为现实服务。

本书的作者们正是这样做了。他们不象有些人那样，只是夸夸其谈，喋喋不休地议论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却不能“有的放矢”地去说明和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他们遵循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走出研究所，深入实际，

敢于面对现实，研究现实。通过对实地进行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付出了大量辛勤劳动，写出了这本论之有据，言之有理而颇有新意的论文集。这是我区社会科学理论界出现的可喜现象。当然，对某些理论问题会有不同看法，应通过百家争鸣的方式逐步趋于一致，更须通过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来检验才行，这就属于另一问题了。我认为对本书应首先肯定的是：作者的这种精神和治学态度，应该提倡；这种方向，应该坚持；这个路子，应该继续走下去。因为只有这样，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才可能趋向繁荣，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哲学才不会出现贫困，我们的理论才会由实践赋予青春活力，反过来指导人们的实践，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贡献。

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对立面是思想僵化、教条主义。我区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还不能说已经完全从这种主观主义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那种领导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而常年不走出办公室的倾向，那种研究社会科学而不深入社会实践的倾向，那种只拘泥于书本知识而不联系实际学习社会的倾向，必须下大决心进行克服和纠正，我们的理论工作才会充满时代的气息，适应时代的需要。

一九八八年元月

前　　言

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册子，是我们宁夏社会科学院部分理论工作者近年来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宁夏回族聚居地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而写成的若干篇调查研究报告和论文中的一部分。

宁夏是全国唯一的回族自治区，作为主体民族的回族问题，自然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探讨回族聚居地区四化建设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从理论的高度上回答现实中提出来的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是我们宁夏理论研究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宁夏回族聚居地区，特别是回族人口相对集中的宁南山区（即西海固地区）是全国有名的贫困落后地区之一。我们课题组中有的同志曾经在这里工作生活过十余年，耳闻目睹了这一地区贫困落后的状况，对于外界人很难想象的这一地区的回汉族人民苦楚的生活情况有着深切的体察和感受。良心和责任心迫使我们以极大的注意力和兴趣去研究这一地区的问题，以求寻找到一条能够使这一地区的人民迅速摆脱贫穷落后，走向现代化的道路。

回族聚居地区要改变目前这种极端落后的状况，诚然，中心的一环是经济建设和经济开发。然而，以往的实践告诉

我们，就经济抓经济不是一条根本的出路。事实上，贫穷和愚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改变贫穷必须同时向愚昧开战。唯有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同步进行，经济、思想、文化一体化发展的方针才能使这一地区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落后，走向现代化。近几年来，对于这一地区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问题业已展开了讨论，并取得了不可忽视的一些成果，但比较起来，对于这一地区的神神文明建设问题的研究，特别是从总体上和理论上进行研究则显得很不够，远远不能适应这一地区全面建设和改革形势的要求。

同经济建设一样，回族聚居地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面临的情况和矛盾有着极大的特殊性和特点。如何认识这些特殊的矛盾，从实际情况出发去建设这一地区富有民族特色和地区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作为宁夏的理论研究工作者，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去研究回答这些问题，力图在说明这些问题上作出自己的理论贡献。这也就是我们选择研究回族聚居地区精神文明建设理论问题的初衷或出发点。

为此，这一课题一提出来，就受到宁夏社科院领导和有关方面的重视和支持，并被推荐为自治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课题。宁夏社科院党组分工张永庆副院长负责并参加课题组的研究。课题组由张永庆、张同基、李金棋、阎佩公，戴建宁等同志组成，推选张同基任课题组组长。后来，成员虽有所变动，但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得到了我院其他一些同志的大力支持和配合。因此，这个课题的完成，凝结着许多同志的智慧和心血。收入本册子中的十篇调研报告和论文，除《纳家户村思想文化及智力开发的调查》一文是由阎佩公同志执

笔外，其余均由张同基执笔。尽管这些调查研究报告和文章是由一两个人执笔写成的，但有些是写作前经过参与调查的同志共同研究过的，有些写成初稿后，曾在有关部门和一些熟悉情况的同志中征询过意见，并先后召开过两次咨询座谈会，就其中一些观点进行了讨论，最后由执笔人修改而成。但不能否认，文章中的一些基本观点主要是执笔人的观点，并不能完全代表课题组或参加过讨论的同志的观点。本着文责自负的原则，如果有什么不妥和失误，责任应由执笔人负。

研究这一课题是从1984年开始的，历时三年完成。在这三年中，课题组的同志共调查考察了我区13个县(市)，20多个回民乡和近30个回民村；还了解了8所回民中小学；我们采取观察、访问、座谈、抽样书面调查等多种调查形式，同上以千计的回族干部、群众、宗教界人士、教师、学生等各界人员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了解。在听取他们的意见和看法时，还就一些理论问题进行过讨论。除此以外，我们还选择了全区最大的回民村——永宁县纳家户村，作为综合调查的基地，从而取得了对一个回族社区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认识。

收入本册子的调研报告和文章，一部分曾先后在公开或内部报刊上刊载过，有的曾作为内部报告提供自治区有关领导部门作为参考；有的发表后被区外刊物转载，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受到一些好评。但由于受当时资料和客观条件、认识能力的限制，一些结论和观点同后来进一步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和观点在大体上一致的情况下，个别地方也不尽一致。在收入本册子时，除个别地方作了些文字加工外，基本上保留了原来的面目，以便真实地反映我们研究工作进展的足迹。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特别是民族落后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需要探索的问题更多，而且更复杂。限于我们自己的水平和能力，不可能在有限的时间里研究所有的问题，大量的问题有待于今后去研究。我们虽对有些问题有所涉猎，但涉猎得也不深，多半是提出问题，而未能对问题本身作出圆满的解答和说明。如果说我们的研究工作是有益的或有所收获的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上：

1.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一些可供进一步讨论的基本观点。

2. 通过对“六五”时期这一地区建设精神文明基本经验的回顾与总结，提出了今后这一地区建设精神文明应遵循的基本方向。

3. 重点通过对回族地区落实民族宗教政策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调查分析，揭示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对于民族地区两个文明建设的巨大意义；揭示了现阶段宗教活动的基本趋势；阐述了伊斯兰教活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两重作用”的发展规律，从而为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活动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问题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4. 通过调查，初步揭示了宗教对回族青少年影响的具体状况及其影响的机制，为正确认识回族青少年的思想状况，有的放矢地加强对他们的思想道德教育提供了一定的根据和意见。

此外，在探索民族教育的改革方面，在研究这一地区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方面，也大胆地提出了一些见解。

作为一项重大的研究课题，仅仅取得上述一点成绩是远

远不够的。我们深感自己的理论研究工作不能适应改革形势的发展需要。由于我们的理论根底不深，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和体察不够深入透彻，加上调查研究的方法不尽完善，因此所提出的某些观点和看法，或者不免有某种程度的主观片面性，或不免流于空疏。我们诚恳希望能听到不同的意见和批评。我们并不认为这项研究课题可以到此结束，实际上我们只是在起点上迈出了第一步。我们盼望有更多的同志同我们一道来共同研究宁夏四化建设中不断涌现出的新情况、新问题，为搞好宁夏地方的两个文明建设尽职尽责。

张同基

1987年5月

目 录

回顾与思考

- 对宁夏回族聚居地区“六五”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形势的分析 (1)

对宁夏回族农村近年来宗教活动势态新发展的调查分析 (14)

关于伊斯兰教活动在回族聚居地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两重作用”的分析 (27)

一个特殊的童心世界

- 对部分回族中小学生宗教信仰和宗教意识状况的调查分析 (44)

关于宁夏民族教育几个问题的再认识 (60)

一个回族村庄的变迁

- 永宁县纳家户村两个文明建设的现状及面临的问题 (76)

回族知识青年的思想状况及其呼声

- 纳家户村六十名知识青年的调查 (88)

纳家户村思想文化及智力开发的调查 (94)

回族聚居地区精神文明建设的几个根本认

- 识问题 (105)

对几个关系问题的哲学思考 (132)

回 顾 与 思 考

——对宁夏回族聚居地区“六五”时期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形势的分析

同全国的形势一样，宁夏的回族聚居地区（注），“六五”时期也是最好的时期之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生产逐年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大多数群众生活逐年有所改善，这是形势的基本方面。这一地区的广大干部群众根据党中央提出“两个文明一齐抓”的方针进行了艰苦的工作，围绕抓经济建设，治穷致富这一中心进行了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进一步完善农村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的变革必然要求改革上层建筑中与之不相适应的因素，物质文明建设的进展呼唤着精神文明建设与之同步，治穷要求同时治愚。由改革所产生的这种客观必然性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来，便产生了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就总的基本趋势来看，“六五”时期这一地区的工作出现了三个初步的转变。

一、由片面追求农业经济单轨道的发展向重视经济、文化一体化方向发展的初步转变

我区回族聚居地区大部分分布在偏僻山区和黄河两岸的沙碱地带，这种不利的自然地理条件，严重地影响了这一地区生产力的发展，加之过去“左”的经济政策的破坏，使得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极端落后，在实行生产责任制以

前，大多数回族农民生活温饱没有保障。以回族人口占45%以上的固原地区为例，1978年是该地区历史上第二个好年景，但人均分配口粮也只有166公斤，其中低于150公斤的生产队2 704个，占生产队总数的48.3%，人均分配收入49元，其中不到40元的生产队2 145个，占生产队总数的38.6%。为了改变这种极端贫困的状况，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领导的指导思想和精力全倾注到抓好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上去，物力财力的分配也是优先保证农业的投资，其他各业都为农业让路。如固原地区在70年代用于农业的投资达1.6亿多元，用于社会救济的为5 011万元，而同期用于文化教育方面的投资甚至低于同期社会救济的金额。当时普遍的认识是，“只要把经济（实指农业）搞上去了，才能谈得上其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只认识到经济落后带来的社会问题，认为肚子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包括文化教育落后的问题）统统可以“迎刃而解”。尽管这种认识现在看来是有局限的，甚至是片面的，直观的，但在当时却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因为当时并不具备改变这种认识的历史条件。

“六五”时期以来农村的改革，创造了改变这种“唯经济”的认识和单向思维的历史条件。这个改革，打破了大锅饭的僵化体制，实行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村生产责任制，鼓励农民勤劳致富，发展农村的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致富的竞争和商品经济的竞争，实质上就是不同素质的竞争。那些有文化、有技术、有能力的人脱颖而出走在发展商品经济的前头，成为最先摆脱贫困的富裕农民，那些只有体力而缺乏才智和文化的农民却困惑、徘徊，想富找不到门路。这种客观趋势一下子把文化教育的问题突出出来了，使得

愈来愈多的人，包括广大的回族干部和群众意识到，文化教育因素是经济工作中的内在因素而不是外在因素，文化教育落后与社会经济落后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经济落后不仅是由于自然条件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由于长期忽视了文化教育，从而导致人口、劳力的文化科学素质太差的原因。这是根本观念的变更，也是我们在民族地区工作中的一次认识上的飞跃。尽管由于回族聚居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尚处于萌芽阶段，经济生活仍限制着许多人的思想认识，还不能说在农民中忽视文化教育的倾向已经根除，但在改革形势的推动下和党中央关于要重视文化知识，重视教育的政策的指引下，至少在各级领导部门和相当数量的乡、村基层干部中对于文化教育的重要性有了觉醒和新的认识，因而产生了在抓经济工作的同时必须抓文化教育的紧迫感和自觉性，当然，对这种紧迫感和自觉性还不能估计过高。我们不但可以从各级领导近年来的各种讲话、报告、文章中看到这种转变的意愿，而且从近几年来各级组织所采取的一系列实际步骤中也可看到这种转变的客观态势。就以投资的比重为例，“六五”时期，全区用于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的投资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在基本建设投资上，用于科研、文化教育和卫生等方面的基建投资，“一五”时期占全区基建总投资的11.2%， “二五”时期为3.8%；“四五”时期为0.98%；“五五”时期为6.6%；而“六五”时期则增加到13.1%，总金额达到2.7亿元，比“五五”时期增加1.5倍，是1981年以前的三十一年投资总和的1.65倍。全区科研文教卫生的事业费，“六五”时期总额达83.2亿元，占同期财政支出总额的23.2%，是“五五”时期的2.2倍，接近达到1981年以前31年该项事

业费的总和。其中用于发展教育事业方面占的比重最大。我区在回族聚居地区“六五”时期用于文化教育方面的资金，无论是基本建设还是事业费，特别是教育经费都有了长足的增长。例如，固原地区用于小学教育的教育经费比“五五”时期增加2.34倍。该地区还把国家援助不发达地区的资金的1/3，用于发展民族教育事业。

在“六五”时期前，各级挪用文化教育资金的现象非常普遍。“六五”时期这种局面不但基本上得到了扭转（但未根绝），而且出现了各级自筹资金办文化教育事业的积极性。例如同心县把1985年当作“教育年”，把地方财政的一半（70万元）用于教育事业，还动员社会力量集资办学。出现了国家、集体、个人办学的势头。吴忠市从1981年以来，除上级政府部门及市地方财政分配给回民中小学正常的教育经费外，还另外挤出123.6万元用于改善民族教育的教学条件。该市的回族聚居地东风乡从乡镇企业发展资金中拿出19.6万元用于改善该乡的教学条件。除了发展普通教育外，还大抓了农民的技术培训和扫盲，仅同心县，近年来就有2万多回汉农民参加了各类专业技术培训班。各级有关部门已把对农民进行科学知识的普及当做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一件大事来抓。

如果说，认识到必须从大力种树种草入手，以改造遭受破坏的自然生态，从而改变这一地区（主要是南部山区）的农业生产长期落后的面貌，是“六五”期间经济建设方针上的一个重大突破的话，那么，从抓好文化教育和人才的培养入手以改变这一地区的穷困落后的社会面貌，则是大政建设方针上的一个突破。这个突破比前一个突破意义更加重大和

· 深远。前一个认识上的突破旨在改变这一地区自然生态的不平衡、不协调，建立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后一个认识上的突破则旨在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地区社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建立整个社会系统的良性循环。经济文化一体化发展的方针，就是两个文明一齐抓的方针，“七五”期间我们必须更加坚定地贯彻这个方针。

二、从关心人的温饱问题到关心人的全面需要的初步转变

由于长期的贫困，解决温饱问题过去一直是我们在这一地区工作的着眼点和落脚点，“让群众吃饱穿暖！”曾经是干部工作的誓言，也是他们追求的最大乃至唯一的目标。直到现在，我们还不能说这个想法和口号已经完全过时，因为这一地区，特别是南部山区回族聚居区至少还有相当一部分群众的温饱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特别是受灾年，情况更为严重。但是近几年来的改革毕竟使大多数人在正常的年景下，吃饱肚子的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现在有了比吃饱穿暖更高层次的需要，他们不但要求有丰富的物质生活，而且要求有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不但要求生存，而且要求发展，特别是使自己精神世界得到发展。我们应当关心群众多方面多层次的需求，特别是精神生活的需求。如果我们只满足于群众的温饱问题的解决而停滞不前，就证明我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很不完全彻底，改革也会因此停顿不前，大多数群众就会因此从物质的饥荒中摆脱出来，又陷入到“精神的饥荒”中去！这种饥荒虽不会死人，但却会造成许多后果不堪设想的社会问题。这种客观趋势促使这一地区的各级政府部门开始对农村的文化建设有了新的认识，从而

把这项工作列入议事日程。他们采取了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的方针，大大调动了上下办文化事业的积极性，从而加快了回族聚居地区农村的文化事业的发展。截止1985年底，有90%以上的回族聚居乡镇办起了文化站，40—50%的回族聚居村兴办了文化室（或称为“青年民兵之家”）。许多地方利用各种文化设施向农民群众进行科普知识的宣传，开展扫盲活动，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商品知识和专业知识的培训，开展群众性的娱乐活动。一些农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旧的生活方式有了初步改变，还出现了农民家庭文化室和文化专业户。短短几年，城乡三级文化网已初步形成，加之电视也开始进入一部分回汉族农民家庭，现代的大众传播手段有所发展，从而使这一地区的广大回汉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有所改善。三级文化网的初步建立是“六五”时期这一地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成果，它的不可估量的意义和作用将在今后愈来愈充分地显现出来。但必须看到，仍有许多同志对发展农村文化事业的意义和作用还缺乏应有的认识，致使相当一部分文化馆、文化站、文化室存在着严重的资金紧张、设施简陋、队伍不齐、人员缺乏、管理不善等问题，还不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农村的电影放映也由于资金和管理不善等问题使一些地方场次大大减少，有些偏僻回族村庄，除了宗教活动外，几乎没有其它任何精神文化生活。

对于回族聚居地区的文化建设过去存在着严重忽视的倾向，“六五”期间这种倾向有所扭转，但从总体看来，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至今有的同志仍把农村文化事业看作是“玩玩乐乐，无关紧要”。这主要是对文化建设在该地区两个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在许多人看

来，回族聚居地区的文化落后只是指人口受教育的程度低，文盲多这方面，没有看到文化生活滞后和贫乏的一面。殊不知不去逐步改变该地区精神文化生活贫乏落后的状况，不去发展农村的文化设施，现代文明文化信息就难以传播到这一地区，新观念就很难注入到人们的头脑中去，也就不可能改变人们轻视文化科学知识的传统观念，因而封建迷信等等愚昧现象就无法消除。这样农村与城市的差别，先进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别以及民族之间的差别就会愈来愈扩大，即使一些受过教育和启蒙的人也会因回到农村后缺乏现代文化的继续熏陶和滋养而逐渐退化。据我们在一些回族聚居村庄的调查，百分之八九十从小学、初、高中毕业回村的青年，由于没有丰富的文化生活，没有再受教育的机会，其文化素质明显地降低。他们说：我们最怕的不是农村艰苦，而是农村生活枯燥。在回答

“当前你最迫切的愿望是什么？”这问题时，有80%的青年的回答是“迫切要求丰富农村的文化生活。”精神文化生活的枯燥和缺乏，不但失去引进人才的吸引力，而且还会使本地生长的人才扎不下根，当前山区人才的大量外流一个重要原因不是由于物质生活艰苦，而是由于精神文化生活贫乏。

因此，必须把文化建设当作回族聚居地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工程来抓，以文化建设带动思想道德的建设，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和吸引。“六五”时期虽然朝这个方面迈出了一步，但这一步迈得很迟缓，自觉性还不高，效果也还不理想。在文化建设的投资上，这几年虽有所增加，但还没有什么突破。全区用于文化建设和社会事业的资金还不到全区财政支出的2%，而且大部分用于城市，用在农村特别是山区回族地区的微乎其微。今后，应当

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增加农村文化建设的投资，国家要重点扶持偏僻落后地区的文化设施的建设，国家支援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资金或补助费，要有一定的比例用于发展这些地区的文化建设；同时要继续鼓励集体和个人办文化事业的积极性，克服单纯依靠国家办文化事业的依赖思想。对于从事文化事业的专业户要从政策上鼓励并保障他们的合法收益。特别要认真解决好农村邮路不通、订阅报刊难的问题，组织图书下乡。电影管理体制必须改革，使更多的群众看到电影。同时要通过宣传教育，引导农民逐步改变只重视物质消费不重视精神文化消费的旧的生活方式，在物质生活有了改善的同时，注重精神文化生活的改善，逐步增加文化消费。总之，我们应当象关心群众的物质生活那样去关心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象重视经济建设那样去重视文化建设。

三、由不切实际的工作作风向重建设、重实效的路子的初步转变

要彻底纠正脱离经济建设，脱离回族群众的思想发展水平和传统文化心理，一句话，脱离实际，凭主观去做回族群众的思想工作的作风。如果不改变“左”的思想指导，仍以为只要通过“革命大批判”，凭着“斗私批修”的“思想革命”和“硬灌输”，就可以改变回族农民的旧的思想道德观念，达到提高社会主义觉悟的目的，那是天大错误，历史已给了我们惨痛的教训，无须赘述。

“六五”时期我们在引导教育回族农民同传统的旧观念决裂，向现代化道路迈进的工作有一个历史性的转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上：

第一，认识到思想观念的转变不是任意发生的，归根到